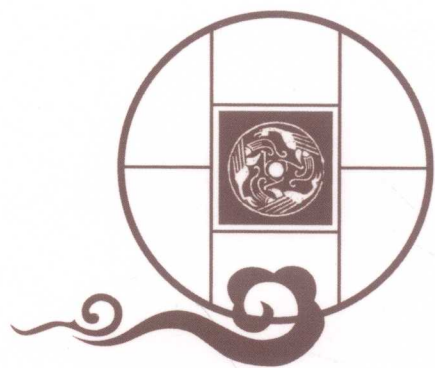




老庄 礼乐观研究

胡静 著

青海民族大学博士点建设学术成果

老庄 礼乐观研究

胡静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庄礼乐观研究 / 胡静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108-7868-8

I. ①老… II. ①胡… III. ①礼乐—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7388号

老庄礼乐观研究

作 者	胡 静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2.5
字 数	20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868-8
定 价	6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

《世说新语·排调》载有一则趣事：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远志，是一种中草药。它的根名远志，苗名小草。人问：“怎么同样一种东西却有二种名称呢？”不足为奇。美恶无定称，贤愚无正辞。例如同一件事，在名人与俗人身上，则殊有短长；名人貌丑，称为粗犷豪放、高大威猛，俗人就是长颈鸟喙、獐头鼠目；名人强聒申辩，叫雄才宏论、争奇斗异，俗人就是烦言碎语、争长竞远；名人与人亲睦，叫做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俗人则是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名人的缺点是白玉瑕疵、微过细故，俗人是黑漆皮灯、泥塞竹管；名人乱头奇服，叫做落拓大志、艺术素质，俗人则是不衫不履、流里流气；名人喝酒是狂吟豪放，俗人叫烂醉如泥；名人要老了称苟老，俗人就是老苟。

《王粲·务本传》说：“种有常时，耘有常节，收有常期。”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进退盈缩，与时迁移，都难离“礼乐”这个语文表词，所谓“语文表词”，是指某一语言之中，能够代表事物或表达意义的语文项目。

词场月白，辩囿日新。“礼乐”表词虽屡出，称述却不相为语。

一曰“关键词或术语”。

从主题学的角度要求，确定并正确阐释关键词，对于分析（文章或著作）的结构和主题是至关重要的。《论语 泰伯》：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美丑、善恶意识兴起于“诗”，立身处世要靠“礼”，情操的完善在于音乐。这里提出了诗、礼、乐三个关键词。

“礼”作为个人生活的准则，它对人们的饮食、起居和进退等日常的一切行为进行了规范。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准则，为人们制定了祭祀、征伐、奖励、升迁、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各种社会活动的规范。礼以人为根本，以诚敬为基础；脱离仁和诚敬，礼就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毫无意义可言。

乐，古代指诗、音乐和歌舞三者的结合。

我国自古就重视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古代学者认为，艺术是人生重要修养手段之一；而艺术最高境界的实现，却又依赖人格自身不断地完善。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稳定了道德的力量。所以，孔子认为，乐的艺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可以作为人格修养的一种工夫。

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对音乐的重视，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学鼓琴于师襄”，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对音乐痴迷到极点。即使在危难之际，还不忘用音乐来鼓舞意志。这一方面是来自对古代乐教的传承，一方面也来自他对乐的艺术精神的深层发掘。

孔子不仅欣赏音乐，而且对音乐做过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使得诗与乐的配合，达到了更完美的境界。

西方学者也承认艺术的“教化”作用，他们认为“教化”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训练，作为一种心灵的机能来说，它是指趣味的教育，或“美的意识”。这是一种辨认什么是美的能力，以及欣赏美的感觉性。“教化”可以使人获得一种广博的精神，任何特殊门类的价值都无与伦比，因为它能使人们的精神高尚起来，足以激起心灵中的一切潜在的精力，足以使一切精神空间具有活力，并不断扩充这个空间，最终成为有教化的人或民族。

荀子认为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在社会生活中乐有重大的治国安民的作用，在宗庙之中、在君臣上下之中、在父子兄弟之中，乐能发挥“和敬”“和亲”“和顺”的功能，乐具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移风易俗”的力量。乐还能够陶冶人的性情，“乐行而恣清”，欣赏乐能使人“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荀子还对各种礼义、各个等级所用的乐做了较详细的论述。

以上对“礼”“乐”这两个关键词的解释，用的是传统的“诠释”的方法。

“诠释”一词，最早见于《颜师古·策贤良问第一道》：“所意如何，停问诠释。”然而解说、注释的活动，应该说在文字产生以后就开始进行了。中国在这个领域自当前行，可以作为范式的东汉郑玄注经是从章句内解说文义，南宋朱熹注经是从章句外“得不传之学”。19世纪末，欧洲人从神学解经，即对圣经字句的解释中发展了对解说的研究，译为诠释学、阐释学或释义学。它的范围广阔，不但是方法论，而且是本体论；不仅和语义学、历史学以及现象学哲学的发展相关联，而且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关于世界的解说也有联系。

诠释学的任务就是分析者可以悉心探求作者的本旨，也可以从自己的时空出发，赋予作品新的解释，这种“新释”能够给作品添加新的美学意义。

金克木先生在《谈格式塔心理学》一文中指出：“一门科学的高门槛往往不是其理论体系和观点而是其特殊术语……符号学研究符号而本身除利用语言学一些术语外，又有一套术语。”而我国古代的诠释只是对字、词的解说、注释。它不要求给字、词增添新的美学意义，而强调论证的科学性。对每个字、词都要说解其形、音、义，能够从孤立的、分散的条目中，寻根问底，找出内在联系，探明义例，释疑正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对“诗”的解释，需要运用这种方法：

(1) 文学体裁的一种。具有节奏韵律，可供歌咏。早期的诗，多是四言，以后五言、六言、七言等相继而起；到唐朝才有古体和近体的分别；现代更有所谓的新诗，或用韵或不用韵，形式已经不像旧诗那样正气。《说文》：“诗，志也。”《毛诗序》：“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国语·鲁语下》：“诗所以合意也，歌所以咏诗也。”《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2)“诗经”的简称。《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史记·孟子荀卿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3) 孔子经常讲诗、礼并列。在先秦时代，《诗》是表达个人思想情感的方法。

孔子使诗具有了道德和伦理的内容，因此与礼联系在一起，这是《诗经》儒化的开始，从此《诗经》不仅仅是一部文艺著作，也是儒家的伦理教材，化美为善，我们研究儒家的美学思想不能不懂他们的伦理学，这可能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二曰“观念和范畴”。

从哲学的高度着眼，经过理性概括，抽象出“仁义”“礼乐”“忠恕”“圣智”等观念和范畴，它们是儒家观察社会现象，处理社会问题、进行道德修养的总原则。

三曰“文明”。

从礼的起源到周公首次加工改造，开始用“德”来概括原始礼的全过程。德不仅包括人们主观方面的修养，也蕴藉客观方面的行为规范，这就削减了对等交换性质，丰富了礼的内容，使礼纳入了道德范畴。及至孔子的再加工，更提出“仁”和“礼”相辅而行，彻底剔除了礼的交易内容，这是新命题，加上孔子之所谓“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正乐章，整《诗经》的创举，从此中国传统的礼乐系统定型，体统薄海，仪观层峦的完备礼乐构成宗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这种礼乐文明被后世的封建社会所继绪，进取为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型范和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我国素以“礼义之邦”或“礼乐之邦”著称，就是对这个评断的谥议。

人类哲学思维符合规律的历程必然有其共性，但人们却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因此才产生了不同结构、不同位阶的称述。还有冠上“文化”的，因为在这里与“文明”词义交叉，就不再列述了。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和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说法，虽然古今学界多有不同理解，但这是儒家的“家长里短”，恐怕没有多少质疑和困惑。

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但在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道两家。这是因为：儒道两家在社会与自然、群体与个体的对立中各自把握了一端，从而使它们能够糅合各家，以其对立和补充，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儒家的伦理型哲学代表了宗法思想文化，道家的自然型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宗法思想文化的怀疑、否定和批判。这样又使儒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实现了相容与互补，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张松如、陈鼓应《老庄论集》）

儒道两家的鼻祖孔子的思想除逻辑方法与老子相对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关键词和术语也是相异的。如“礼”：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庄子的思想基本的立场是和老子一致的。《诗》《书》《礼》《乐》是儒家道统赖以建立的基础，孔子一生为继承、捍卫和发扬这个道统而奔走呼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庄子主张“坐忘”。“坐忘”是道家最主要的修养方法之一，指修心时，忘了自己，忘了外物，与道为一。《大宗师》里“忘”的顺序是：忘仁义，忘礼乐，然后坐忘。仁义是比较普遍、比较抽象的理想或原则，礼乐是比较具体、比较实在的规范或操作；而坐忘，则是针对自我，再化解形与知的作用，等于“忘己”，然后能够“同于大通”。普通人忘仁义较易，忘礼乐较难，忘记自我则更难。但忘仁义、礼乐是忘己的前提。

庄子幻想超脱喧嚣的尘世，淡忘人间订立的规范，让心灵沉浸于天道，因此假托儒家代表人物的对话，分三次程解为道日损的三部曲。庄子认为仁义应发自天机，出自真情，不为追求名利，不靠口舌推行。宣扬会导致庸俗化，儒家席不暇暖地倡导仁义，会被伪君子所利用，使仁义变成追求名利的工具。

由此可见，继承、捍卫和发扬礼乐精神，是儒家学者的任务。

贤媛学子胡静，疏达有远志，酷爱老庄，入理泓然，学士论文《庄子寓言中的神话思维》和硕士论文《庄子寓言研究》，精明朗然，均非凡识。现读博期间又撰《老庄礼乐观研究》一书，可谓卓莹简畅，甚相叹赏。

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礼乐”对儒家来说属于肯定命题，对道家来说属于否定命题；即是“命题”都需要“演绎”，因而《老庄礼乐观研究》这个书名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另外，从当时各学派的生成状态来看，很少见泾渭分明和绝对醇化的。客观比较道、儒两家的思想和方法，在“道”与“德”的基本观念上并非水火无交，仍有相容互通之处。而在对待“礼乐”的态度上，道家内部也不是铁誓钉封的，以下两种情况值得重视：

第一，区分庄周思想和“后期庄学”。

任继愈先生说：“一部大书往往代表一派，而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这是先秦著作中常见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一书的思想，在思想体系中有明显的不相融矛盾。因此首先弄清庄周의思想和‘后期庄学’的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庄子哲学讨论集》）。

老子和庄子都反对仁义礼乐、法治和形名之学，而《天地》《天道》《天运》三篇却与之根本相反，它纳之并以“道”统帅之，视其为“道”之末或“道”之用。“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庄子·天道》）。

《让王》篇提出“道之真”之外，还有道之“绪余”、“土苴”，这绪余、土苴就是仁义礼乐之类。“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第二，区分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

汉朝的道家与先秦道家对“礼乐”态度有别，如《在宥》篇：

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诋，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

这一段话掺杂了儒家和法家思想，作者提出了一个折衷主义体系，让道德、仁

义、礼乐等各得其所，各从其志。

胡静此书，考虑到类似因素，本着向读者全面介绍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目的，采用儒道通观并述、纵横交错的方法，意在便于初学，力求明确易解，对一些众议难调的问题，特别是“发散式思想家”的新发现和新理论，暂且存而不论。

胡安良

2018年11月21日于湟水河畔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3
第三节 研究意义.....	5
第二章 礼乐的起源和意义.....	7
第一节 礼的起源和意义.....	7
第二节 乐的起源和意义.....	26
第三章 春秋时期礼乐思想的概况.....	38
第一节 西周礼乐制度概况.....	39
第二节 春秋时期礼乐思想内涵.....	57
第四章 老子的礼乐观.....	72
第一节 老子礼的思想.....	73
第二节 老子的音乐观.....	102
第五章 庄子的礼乐观.....	116
第一节 庄子关于礼的思考.....	116

第二节	庄子及其后学批判礼流弊.....	132
第三节	庄子对“乐”的思考.....	151
第四节	庄子后学对于庄子乐思想的发展.....	157
第六章	老庄礼乐理观论内涵.....	175
第一节	道的内涵.....	175
第二节	归本于道的礼乐思想.....	179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83
参考文献		185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传统的礼乐文化由来已久，在中华文明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风格面貌和精神内涵，呈现出不一样的人文色彩，并逐渐演变为礼乐制度，将古代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礼乐是周代文化的核心内涵，这主要和周代宗法制度需要一套尊卑分明的秩序体系有关。至春秋晚期，周代的宗法制度被动摇，政治上尊卑关系逐步瓦解，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①和“陪臣执国命”^②（《论语·季氏》）等情况屡见不鲜，这也就是礼坏乐崩现实的写照。在这样激烈动荡的时代，当时儒、道两家关于礼乐的讨论不再是从宗法制度层面强调，而是转向意义层面来思考礼乐所蕴含的价值。

老子和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家，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关注于此。儒家思想的先驱——孔子，就非常注重礼乐，他认为礼乐是个人修养的必备条件，是社会走向和谐的制度保证。孔子礼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合一”“礼乐化人”和“礼乐治世”，其以“仁”为根本，以“美”为表现，以“礼”为中心，以“和”为目的，以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最高政治理想。我们也注意到了，以孔子开始的儒家思想体系，正是以周代礼乐反思为基点，在反思礼乐的根本价值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和“德”等内核精神，其后儒家思想的发展，便一直离不开礼乐与“德”

①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

②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

关系的架构；但是在论及先秦道家，特别是老子和庄子的时候，大多将礼乐安置于其思想体系较为边缘的位置，认为道家不重视礼乐的，或者认为反对礼乐的，恐怕是忽略了礼乐的反省在先秦道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从伦理层面来讲，我们不难发现道家思想是从老子开始对周代礼乐变迁和解体的反思中开始发展的，这种反思，实际上是对周代礼乐进行新的诠释，这一点在本质上和先秦儒家的礼乐反思是类似的。先秦道家对周代礼乐的反思前提是源于“道”，也就是以“道”作为反思礼乐的理论依据，因此当老子和庄子赋予“道”不同的内涵时，也就赋予了礼乐不同层面的诠释。

礼乐思想在老庄思想体系中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理论地位和意义。由于礼乐代表周代人文建制的核心，因此，老子对礼乐的反思，除了属于春秋晚期礼乐反思思潮的一部分外，也表现了老子对当时社会制度、尊卑等级，以及人性的面向等问题进行了思考。而在庄子学派中，庄子的礼乐观是隶属于其生命哲学与现实反思的脉络中的，庄子一方面从在处世环境中，个人与群体规范以及权力者的意志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如何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角度；另一方面从如何超越生死问题等层面来反思“礼”的内涵，同时赋予“礼”新的意义。另外庄子更是将“乐”从“礼乐”一体的架构中抽离出来，从而揭示生命本体与体现天地、宇宙秩序的“乐”独特的美学内涵。庄子将礼乐安放在其生命过程的脉络中，一方面在礼乐的反思中，具体彰显其生命哲学的内涵，另一方面以个人如何消除生存的紧张性、如何揭示生命的本体以及如何超越生死而体天地之境等为主题进行反思，从而展现了其以生命关怀和艺术审美为特点的礼乐思想。至于庄子的后学者，则继承了庄子的关于礼乐反思的基本思想，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一方面揭示了礼乐的流弊，同时也赋予礼乐积极的价值内涵。

从以上有关礼乐思想在先秦道家理论体系的地位来看，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有重要的意义与地位，本书以老子和庄子的“礼乐”思想为研究主题，尝试就老子和庄子学派关于“礼乐”的反思做出全面探讨，一方面是从思想分析的角度，厘清老子和庄子关于礼乐的思想内涵，包括如何揭示“礼”和“乐”的内涵，如何批判“礼”和“乐”的缺失，同时赋予礼乐新的价值内涵。老子在继承周代礼乐精神的同时，又用“道”来给予礼乐精神新的解释；庄子则侧重于

以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层面来反思礼乐，他由人与“礼”之间的紧张性开始，通过消除紧张性而赋予礼新意，庄子后学对庄子的礼乐观也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就思想史的角度来讲，老庄的礼乐观，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提倡或批判的问题，他们对礼乐反思的思考面向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节 研究现状

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所知，目前为止，学术界有关老庄礼乐观的研究虽没有成体系的作品问世，但相关或相近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笔者大致梳理了以下几种：

一、关于先秦礼乐思想的研究

关于这部分研究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合论先秦礼乐思想；二是专论先秦礼的思想；三是先秦乐的思想。这一主题的专著和期刊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比如专著方面，如杨华所著的《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此书主要从文化与制度层面讨论周代礼乐文化，并概括了先秦诸子对礼乐的反省；黄宛峰所著的《礼乐渊薮与中国文化礼乐》（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金尚理所著的《礼宜乐和的文化思想》（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和祁海文所著的《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在期刊论文方面，大可的论文《论先秦礼乐的发展变迁及其思考作用》（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郑维铭的《先秦礼乐思想的伦理意蕴与现代启示》（武陵学刊，2005年）和刘绪晶《论先秦礼乐教化之“和”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文教育的启谕》（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等。在上述著作和论文中，论及先秦道家礼乐思想者，只属于其论文整体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老子和庄子礼乐思想。

二、专论先秦礼的思想

专论先秦礼学的专著有：勾承益所著的《先秦礼学》（成都：巴蜀书社，2002

年),主要侧重于就思想层面来专论先秦礼学内涵、刘丰所著的《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彭林所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陆建华所著的《先秦诸子礼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和郑宪仁所著的《野人习礼——先秦名物与礼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相关论文有:商国君的《先秦礼学的历史轨迹》(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唐凯麟的《先秦礼文化凸显的道德生活》、钟琛的《礼崩乐坏新释——先秦礼乐的传播学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陈赟的《先秦礼文化与语言雅化》(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和姜广辉的《先秦礼学综论》(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等,以上论文主要侧重由文化、制度以及社会层面来分析礼乐在先秦时期的地位。

三、专论先秦乐的思想

关于此主题的专著有:蒋孔阳所著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李纯一所著《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蔡仲德所著的《音乐之道的探索:论中国音乐美学史论及其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和刘宇统所著的《先秦音乐自然观史料研究》(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年)等,以上论文主要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先秦诸子的音乐观点。相关期刊论文有:官性根的《试论先秦乐论思想的演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张源旺的《先秦乐论的两种态势》(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李春娟的《先秦乐教思想以及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巢湖学院学报,2010年)、肖艳丽的《先秦乐的地位以及儒家乐论的演变》(前沿,2014年)、蒋立平的《论先秦乐教精神在高职德育中的传承与发展》(当代音乐,2017年)等,以上专著或论文专门论及老子、庄子礼乐观部分较少,有的文章甚至都没有提到。

四、专论老子或庄子关于礼乐的观点

此类研究少见于专著中,而多见于期刊论文中,据笔者查搜所得,此类论文大约有150余篇,论文如张松辉的《论老子礼学思想》(中国哲学史,2005年)、许春华所著的《老子礼学思想新论》(东洋伦理与文化第18次韩中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论

文集, 2010 年)、李昊的《从对大音希声的误解析老子音乐美学思想的本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5 年)、陈永贤的《老子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年)、王新建的《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哲学研究, 2005 年)、西北大学张娜的硕士论文《庄子礼学思想探究》(2016 年)、轩小杨的《庄子乐论的美学启示》(渤海大学学报, 2011 年)和华东师范大学林妮的硕士论文《庄子音乐美学研究》, 以上论文专论了老子或庄子对于礼乐的反思观点。综合以上前人有关研究成果概述, 有关老庄礼乐观研究的专题, 较少见于论著中。

第三节 研究意义

早在夏、商、周时期, 古代圣贤就通过“制礼作乐”, “礼”和“乐”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 将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 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伦理和谐。从周朝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 再到以后每朝每代的“制礼作乐”, 这中间很明显存在一个断层。那么, 是谁将这个断层连接起来的呢? 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贡献者, 儒家学派的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通过对礼乐的解说主要是为了彰显礼乐文明的内涵, 强调其道德教化和治世功能。道家学派的老子和庄子继承和发展了礼乐文化, 并对礼乐有着独特的见解, 老庄的礼乐观与孔子大相径庭, 礼尤为甚, 本书的主要研究主题就是老庄的礼乐观。

在中国文学史上, 《老子》一书作为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其内容微言大义, 真可谓一语万端, 被赞誉为“万经之王”; 《庄子》是一座蕴藏量巨大的寓言艺术宝库, 一部杰出的古代寓言总集。《老子》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 它主要阐述自然无为的思想, 其中也包含了朴素辩证观点。《庄子》一书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 其内容涉及哲学、人生、政治和社会等诸多方面, 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批判和美学精神等; 庄子之语汪洋恣肆, 想象丰富多彩, 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鲁迅先生曾言: